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水边人家

SHUIBIANRENJIA

——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
调查与研究



朱健刚 王超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

水边人家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
——中国民间故事选编
（第1000卷）

中国民间故事选编

中国民间故事选编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水边人家

——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

Shuibian Renjia

Yunnan Luoping Xian Buyizu Cunzhai Diaocha yu Yanjiu

朱健刚 王超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讲述了围绕着风景区的成立,云南罗平县一个布依族村寨——多依村是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经验和社会进程的。“旅游-风景区”这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很可能还会继续影响多依村人的生活方式。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 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朱健刚,王超主编 —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47-293-8

I. 水… II. ①朱… ②王… III. 布依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罗平县 IV. K28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879 号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

朱健刚 王超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80247-293-8 / G · 268 (24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文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实实在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	i
前言	1
第一章 河畔人家	3
第一节 村庄素描	4
第二节 自然地理与行政沿革	10
第三节 农作与生计	19
第二章 多依村里的布依人	33
第一节 历史	33
第二节 布依礼俗	36
第三节 传说和信仰	44
第四节 婚姻与家庭	61
第五节 锦绣生活	87

第三章 风景与生活	99
第一节 毗景而居的河畔人家	99
第二节 旅游与生计	101
第三节 工艺与商品	108
第四节 旅游与林业	117
第五节 “农家乐”	121
第四章 风景区的诞生	127
第一节 成立与规划	127
第二节 开发始末	129
第五章 风景中的秩序	140
第一节 三轮车与秩序	140
第二节 竹排	151
第三节 牵马	160
第四节 景区前的摊位	164
第五节 抬轿	165
第六节 景区中的农业冲突	167
第六章 风景的前方	169
第一节 旅游与发展	169
第二节 节日的发展	174
第三节 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182
附录	187
试论多依村农业发展与民俗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187
彝寨24小时	200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布依族家庭生活	209
布依族的织布与服饰	215
刘天明口述史个案(一)	229
刘天明口述史个案(二)	236
结语	239
后记	240

前言

周大鸣

2004年7月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调查组选择了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多依行政村下属的多依自然村作为研究地点，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的队伍由一名青年教师带队，以人类学系2001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也有部分研究生参与进来。选择风景秀丽的多依村作为调查地点，我们有着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罗平地处云南省的曲靖地区，是珠江的源头所在。从流域文化来讲，这里存在着丰富、深厚而多元的文化历史资源。例如我们所调查的多依村是一个布依族村寨，地理位置上毗邻贵州和广西，就在多依村所处的行政村中，还有苗族和彝族的寨子。当地民间人士自己编写的家族故事里，几百年的历史文化跃然纸上。可以说多依村非常符合我们进行珠江流域族群文化研究的基本要求。

其次，在对族群与流域文化所关注的问题中，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就是所谓“风景”与生活的关系。这里的风景并不仅仅是指多依村秀丽的风光，而是指与旅游息息相关的“景观”。众所周知，云南是一个旅游大省，云南省内诸多民族村落与现代性话语的“发展”（development）一词常常就是因为旅游而联系到了一起。而多依村所在地正处于一个当地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多依村距离罗平县的多依河风景区最近的一处不过几十步之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旅游区，围绕着所谓“风景”——这一切逐渐成了多依村日常生活中一个浓重的背景色。今日多依村民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这个风景区，或者说与一组所谓特定的“风景”联系在了一起。随着旅游开发计划在多依河景区的扩展，带有旅游开发色彩的“发展”主义，这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很可能还会继续影响多依村人的生活方式。在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某种人类学对旅游文化（tourism and culture）的关照，而是多依村这个水边人家生活的自然展开。也许我们的一个基本设问是：这个自然村落的居民们何以在变动的生活处境下不断重组自己的历史经验？

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尝试着思考和讲述。书里的一些章节都是用来说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围绕着风景区的成立，一个群体是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经验和社会进程的。对这一过程，我们试图运用民族志的研究和写作方法来表达其微妙的细节，所以我们没有过多地带上某种理论解释的色彩，而是偏重对生活叙述本身的还原。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主要是一份学生作品。也许无论从研究时间或是深度上，它都不能算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我们相信它却饱含着思考和尝试。本书的主要章节内容，基本上从写作到部分编辑工作都是由学生们（主要是本科生）动手完成的。而支撑写作的调查本身，很多时候也是由学生们自己动脑思考、选题、调查、反复验证的。在前述基本思考背景之下，学生们通过协同调查和互补性研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调查研究论文和报告。之后，再根据这些论文和报告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调查材料（例如地图、谱系表、我们自己制作的多依自然村每一户的家庭档案、口述史材料等），加以充实和条理化，最后形成统一的水边人家之“生活叙述”。

从一开始，我们就力图以集体协同调查的方式来弥补调查研究时间方面的不足。这里的集体调查，并不是一种单个调查的简单集合。可以说整个调查和写作，自始至终都有非常细致的设计和规划。我们在出发调查之初就反复进行了调查的流程设计，在实地操作中我们自己编制了调查大纲、工作手册。我们在调查一开始就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为此我们还专门绘制了一张大幅的“村落人家分布地图”，图上标明了每一户人家的姓名和基本情况（用图样表示），每户的调查进展都可以从图上直接看到。每天即使调查和写日记到深夜，我们还是要进行集体讨论，一方面是面对面交流当天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则是讨论如何开展自己所感兴趣的专题研究。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们总是充满了热情，他们可以就一个调查中遇到的问题争论很久，也可以为一个调查的细节反复讨论。调查的整体设计正是基于这种团队合作的互补性优势，所以我们力图做到在对同一个大的主题进行关照的同时，各个小的分题也能一定程度地兼顾。

本次调查也搜集了很多种类的材料，书中无法把它们全部都呈现出来，例如手绘的大量地图、谱系表、多依自然村每一户的家庭档案、口述史材料等。可以说本书的主体内容仅仅是展现了我们调查材料中的一部分。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份学生作品始终还是有着很多缺憾，但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这本书的创作者们而言，本书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是努力的开端。

第一章 河畔人家

故事通常都有一个开端，而我们的故事是从依山傍水的布依族村寨多依村开始的。2004年7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珠江流域族群与文化研究”调查组一行人来到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多依行政村下属的多依村，开始了人类学初步的田野考察。本次调查的调查点选择了在多依行政村下辖的多依自然村。由于此次课题围绕的是泛珠江流域的族群和文化研究，选择云南罗平的多依村一是因为罗平地处珠江上游即珠江源头附近（珠江源就在罗平县所在的曲靖地区的沾益境内），二是因为多依村本身是一个邻水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无论在生态还是在文化上都符合我们本次调查研究的初衷。

初识多依是在夏季里最热的时节。从广州乘坐火车来到罗平，一行人风尘仆仆通过一条颠簸不堪的公路来到这个居于河谷地区的河畔人家——多依村。我们前往多依村的第二天便是一个集市天，云南话叫做“赶该（街）子”。这一浓重乡音词汇下面所涵盖的是云南境内一种特别富于生命力的交易方式——连片大山中的定期墟市。当日，在多依村的这个晴朗的街天里，颜色成了街头某种独立的语言，成片都是或沉或亮的蓝色，那是当地布依族女性衣服和布料上的主题色。在这成片的蔚蓝色之下，街市上的嘈杂仿佛被过滤了。我们隐约感到喧嚣的街市上一种稳健的生活节奏在暗处做着主导。多依的居民有着一种古朴的善意，假如你来到他们的家中，尽管你是个陌生人。但这些都与你一样身处工业社会格林威治时间的人们依然会像对待一个客人那样招呼你坐下，留你吃饭。

然而，正是这些温柔的主人们，你会在风景区内和旁边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有的做些小生意，或是在景区里为游客拉车、撑竹筏。他们中也有的是公路沿线的“农家乐”餐宿店的老板。多依村距离“风景区”（或者说公园），最近的地方不过几十步之遥。这个开发不过数年的风景区是当地的旅游支柱之一，而正是这个支柱每年向村民生活的土地输送了成千上万陌生的游客。多依村的村民们似乎已经非常习惯如何在家的外面，也就是风景区的旁边和这些陌

生的人群做买卖。正如景区附近身着布依族服装的妇女和小姑娘们一面和我们攀谈熟悉，一面也不忘向我们推销她们制作的五色花米饭。村子里人们的生活似乎也像这几十步距离所分割的一般，各属一边，一头是赶街子务农，用乡音招待你坐下。另一头则是招待游客或为游人服务的务商和务工，忙碌地盘算一天的小生意。两头互不相犯，但相距不远。

短暂的熟悉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村子并非我们曾经想象中的某个偏安于云南一隅、毗水而居并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世外桃源。抛开想象，现实中的多依村是一个被“旅游”打上了许多烙印的云南山村。假如说不是在这个炎热的雨季到达此地的话，这里的风景必然对心灵产生某种诗意的催化效果。然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并不是这里的美景，而是这里的居住者们创造和经历着的生活，只是这生活并非仅仅是我们在街市上所看见的那一抹蓝色般的整齐。

故事开了头，就要继续下去。

第一节 村庄素描

多依村位于秀丽的多依河畔，隶属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自治乡多依村村公所。多依村村公所一共由11个自然村组成，约有居民500户。其中最大的是多依河河边河谷地带的板台、木纳和多依三个自然村，为占整个村公所人数约70%人口的布依族所居住。另外还有一个汉族村，一个彝族村，其余的是苗族村，都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山上。

多依村地处云南省东部滇、桂、黔三省（区）结合部的罗平县。这里素有“滇东锁钥”、“一鸡鸣三省”之称，是进出云南的东大门。罗平县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最高峰海拔2468米的白腊山南麓流下的山涧溪流和泾流，一路不知疲倦地奔流而来，在罗平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西门河”。西门河行走数公里后成为伏流，而后冲出地表，几经“浮沉”之后终在一个叫母纳的地方奔涌而出，这就是清澈、平缓的多依河。多依河其实只是红土高原上普通的河流之一，但对于生活在多依河畔的布依族居民来说，它却是一条连接着历史与未来，承载着沧桑与希望的母亲河。正是在它无私哺育下，布依族人世代在此繁衍生息。

一条沿着多依河的柏油马路把我们送进了宁静的多依村，进入多依村，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水中从容转动的一部部水车。清澈的多依河既是指引方向的向导，也是布依族人衣食之源。多依村的饮用水全从汇入多依河的地下泉出水口获取，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被叫做“龙潭”，在每年三月初四都要举行盛大的祭龙潭仪式。而布依族人的灌溉用水也是自制水车带来的多依河水，三月初三染